

V756/
28

义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

目 录

日寇投降前后的义县·····	戴哈生 (1)
义县第一个民主政府·····	屈书绅 (7)
旧社会土匪猖獗人民遭难·····	徐英华、孟庆祯 (11)
一次兵骗·····	吴广锡 (14)
伪满的清乡政策·····	李文斗 (17)
伪满时期的村屯长·····	梁绍贤 (21)
漫谈“当铺”·····	屈书绅 (24)
从伪满义县国高看奴化教育·····	郑元国 (27)
建国前义县城区学校的演化·····	张鼎元 (30)
伪满时期的“并校”政策·····	张鼎元 (34)
“赤足炼成”·····	张鼎元 (36)
伪满时义县北关大凌河两次架桥两次失败·····	戴哈生 (38)
汤玉麟生平片段·····	商成山 (40)
罪恶滔天的伪满警察吴红鼻子·····	李文斗 (44)
医巫闾山义县一侧简介·····	徐英华 (47)
炎汉古刹宝林楼·····	关林春 (49)
清代温庄长公主陵·····	关林春 (53)
南砖城子——大定堡·····	张志良 (56)

日寇投降前后的义县

戴 哈 生

“八·一五”光复前，我在伪义县公署行政科当科长。义县在日本投降前后的情况，我不仅耳闻目睹，有些活动还是亲自参加的。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中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不断扩充兵员，把在伪县公署和其他机关、学校供职的日本人大批征召入伍。从而伪县公署里除副县长、总务科长、警务股长仍由日本人担任外，其余的产业科长、各科科附、属官和股长等都换上了中国人。

由于前线吃紧，日本侵略者有些招架不住，后方也弄得草木皆兵。义县城内时常实行灯火管制，家家挖防空壕，强化对空监视。全县在清河门、花尔楼、稍户营子、石佛堡等地建立六、七处防空监视哨所，由警察带领自卫团员，昼夜值班。如发现敌机，火速向各哨所通报。伪县公署内的防空监视哨，还由日本人带班。日本侵略者终日惶惶不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警务科的日本人，强令财务科搬到伪县公署西院基督教堂去办公，腾出来的房子，归警务科占用。当时大家都猜测：“警务科的办公室不少呀！怎么又要房子？”后来看到他们把办公室间壁成屋，门窗加上铁栅栏，样子象是做拘留所，关押什么人的。所幸不几天“八·一五”日本投降了，他们的预谋没有得逞。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在伪县公署的朝会上，日本人副县

长池田和夫当众宣布：“时局已进入紧急状态，从今天起义县公署改为义县防卫本部，不办公了，全员武装起来，以应付非常时局。今天就拟定编制训练计划，明天起实施……”其实我们在八月十三日已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政府发出的乞降照会。又听到在十五日中午将有重要新闻发表的消息。大家都在猜测，可能日本鬼子要完蛋了。因此，中午下班的时候，大家纷纷往家跑收听广播，日本人也慌忙往家跑。到家后，从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宣读投降诏书，接着是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向国人谢罪。大家听了无不笑逐颜开，额手称庆。

当日下午中国人照常上班，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谈论着日本投降了，谈论着我们遭受十四年的痛苦，谈论着祖国今后的前途，谈论着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等等。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敢于尽情地倾述了。日本人谁也不上班了，连防空监视哨的日本人也不来了。大约下午二时许，日人总务科长打来电话，叫股长以上人员到南关日本人官舍开会。接到电话之后，这些人都去了。日本人光着膀子，腰挎战刀，手举酒杯，哇哇乱叫。副县长池田和夫气势汹汹地说：“过去我们有些粗暴，但已成过去。日本此次虽然战败，二十年后再见。”当时日本侵略者是不甘心失败的，存有卷土重来的梦想。

“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所用的伪官吏，自应卸职待罪，但又恐祖国上级政府前来接收，无人负责办理交待，擅离职守有罪；另一方面，地方一些事务也需要应付等。有鉴及此，乃在众议之下，采取权宜之计，成立了地方自治委员会，为临时的权力机构。凡是有关

大事都要提交委员会审议通过，然后施行。在义县的其它机关有事也可以代为审议。

义县地方自治委员会的组成，由伪县公署的县长、股长、各机关首脑，各街、村长，地方绅士，共三十多人组成，委员长由伪县长金国祯担任，副委员长二人，公推郭兆麟（聚粮屯人，曾任台安县长）为第一副委员长，我为第二副委员长。另外有常务委员五人，其中有汪景辰（北砖城子村长，曾任伪满陆军团长）、裴玉峰（新民屯人，曾任张学良将军的承启官，西安事变后回原籍）、李雨舟（曾任锦县公安局长）和陈殿权（伪义县公署财务科长）等。在常务委员中以郭兆麟为主，以陈殿权为辅，负责接待应酬和写大事记等事宜。

在义县的日本人原打算十七日乘胶轮马车经张弼堡（今张家堡）到石山站乘火车去沈阳，因恐途中被袭击，改变了计划，于十八日零点全部冒雨由义县乘火车逃往沈阳。行前总务科的几个日寇手持武器来到县公署，先烧毁了御神龕和机密文件，随后大寻伪官吏，企图索取巨款。我和陈殿权等人都躲了起来，公推伪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李庆书和教育科长梁公度出面应付。他俩都是外县人，又不是主要负责人，更不担任钱款责任，因而躲过了日寇逼款这一灾难。

自治委员会成立以后，释放了在押人犯。当时义县人民法院监狱中在押人犯有二十多人，经法院提交委员会审议，除一名杀人犯暂时不释放外，其余都取保释放了。

八月二十日，在锦州的日酋打电话找在义县的日寇讲话，我们告以“在义县的日本人已于十八日凌晨乘火车奔赴沈阳去了”。随后在锦州的日酋几次打电话要求义县派人到锦州

开会，或他们来义县，或中途会面，有事相商，但都被我们拒绝了。最后日寇用伪锦州省长王瑞华的名义打来电报，叫义县派人到锦州开会。于是派我和陈殿权偕同翻译二人，武装警察六、七人乘大汽车于翌日开往锦州。当行至七里河子时，被一队伪满国兵拦阻，说锦州很乱，去有危险，于是我们从中途又返回义县，未得与在锦州的日酋相见，究竟日本人最后打算干什么，直到今天还是个谜。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首批苏联红军由朝阳方面进驻义县，为首的一名中校率属下二十余人进城，住在南关县立医院，其余士兵都留在列车上，车上装有大炮。晚间，那位中校叫我们通知在锦州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省公署和铁道局的最高负责人以及日本居留民代表，于当日夜十二点准时来义县投降，不得有误。电话通知后，伪省公署参事官宇都宫仁带着八、九人，于半夜十二点打着白旗准时到达，当即被视为战俘，解除其武装，去掉勋章、略绶，然后每人一室监禁起来。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举行受降仪式。苏军中校坐首坐，中国人侧坐，几个日俘被带入室内，他们首先呈上投降书和礼品。然后用俄语直接问答，大意是在锦州的日军人数，行政人员数，铁路和其它机关情况，以及居留民人数等等。要求他们全部无条件投降。当日酋陈述要求保留部分武器以自卫时，苏军中校予以驳斥，并命令他们赶快回去，通知武装部队和有关人员，当日下午三点钟以前在锦州车站广场集合，准备投降，待红军接收，不得有误。这支苏联红军去锦州接收后，往阜新方面去了。八月二十五日，苏联红军守备队一个营和警卫连四百人，又进驻义县近百天，得

到自治委员会以客军相待，为他们安排了食宿。苏军的进驻对共产党第一次接收义县的各项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协作。

蒙疆德王部下李守信所部一批骑兵哗变，由朝阳窜入义县境内，扬言要进城歇兵。自治委员会恐其骚扰和不轨，乃派常委汪景辰迎到留龙沟，说服他们不要进城。无效。当这支骑兵到达城西郊时，苏联红军出兵警戒。又派人佩带少将军衔伪装陆军武官，骑高头大马显示威风。他们被迫在宋家屯一带露宿，于次日从铁道桥上渡过大凌河，经头沟、前窑一带向阜新方面窜去。

中秋节那天傍晚，我们接到义县车站站长电话说：“新任县长已经来到，在站长室等候。”我们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员前去迎接。当时见到的有县长李竞生、政委高凤来、区长张华民、邱乃成、李山五位同志。进城后，下榻于兴义塾。稍憩后，由我汇报义县地方情况。随后商定于次日上午在大佛寺院内召开群众大会，由街公所通知各户和各机关、学校届时参加。

次日的群众大会非常隆重，参加者异常踊跃。首先我致欢迎词，接着县长李竞生讲了话。他从“九·一八”讲到“七·七”事变，又讲到“八·一五”。这几个阶段中每一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和政治主张，都讲的清晰动人。同时也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和假抗日，真反共等阴谋。到会者听了之后，都说这是第一次听到抗日救国运动的真象，更是第一次见到平易近人、俭朴谦和的共产党人。李竞生县长讲话结束后，他命令在场的伪警察架枪，向后转，走十步，立定。随后宣布所有伪警察人员，暂时停职待命。就这样缴械和解散了伪警察。上午十一时大会结

束。

李竞生县长偕政委高凤来等五人，前来接收县政，建立了民主政权。自治委员会开了一次总结会，随即解散。

新县长在伪县公署大会议室里，召集了伪科长以上主要负责人举行了接收仪式。伪县长金国楨将伪义县公署大印及他的小枪都交给了李竞生县长，从此建立了义县第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府。

义县第一个民主政府

屈书绅

一九四五年九月的义县，乌云尽散，骄阳似火，全县人民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之中，又迎来了第一个民主政府的诞生。中秋节这天，辽西地委派李竞生、高凤来等五名同志，来义县进行接收工作，成立了义县第一个民主政府。李竞生任民政科长代理县长，戴哈生任财政科长，陈殿权任教育科长，曲泽澍任建设科长。成立了政治部，高凤来任组织部长代理政委。全县设五个区，城关区区长张华民，清河区区长张海山，七里河子区区长李树青，大榆树堡区区长邱云成，沈家台区区长梁××。

民主政府建立后，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安定民心。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初到义县，人民还不了解，所以在县政府成立后，于九月下旬某日，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场设在大佛寺院内，参加大会的有政府工作人员，各学校全体师生，农工商各界人士，士绅代表及城内居民等四千余人。在大会上，各界代表向新政府致欢迎词，接着县长李竞生讲话，主要内容是：（1）对义县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十四年的蹂躏深表同情；（2）宣布义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介绍了义县地方组织，安定地方秩序，维护治安；（3）宣传党对农、工、商的方针政策。在农业方面，实行“二五”减租，清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方面，

实行对工商业保护政策，发展民族工商业经济，减轻赋税；在教育方面，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方针，使贫苦人家的儿童都能上学念书等等。通过这次大会，使每个人都初步了解到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消除了顾虑，安定了民心。同时，建立了一支人民武装。从敌伪街村自卫团中，选择留用五十名，新招一百五十名，成立了县支队，维持地方治安。高凤来任县支队政委，赖发春任副政委，王忠任支队长，姜兴任副支队长。

二、实行民主，选举出席省代表和辽宁省长。十月中旬在大佛寺院内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选举我县出席省代表大会的代表。李竞生县长亲自主持选举，参加大会的农、工、商、学各界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选举自己的代表。经过研究协商，最后选出了朱子印、哈四道（回族）、陶淑珍、门治轩、和永成五人为代表。

接着李竞生县长提议，选举张学思为辽宁省省长。他说，张学思是东北素孚众望的张学良将军的四弟，参加抗战多年，功绩显著。参加大会的群众异口同声高呼：“同意！”鼓掌通过。

三、发动群众，清算汉奸。日寇投降，伪警务科特务汉奸高德贤，畏罪潜逃了。广大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抓捕严惩。省代表朱子印等到省开会，在沈阳街上发现高德贤在市场上做小买卖，当即报告当地政府，将高德贤带回义县。

十月三十日，在大佛寺院内召开了清算复仇大会，沸腾的群众挤满了大佛寺院子。会上提出“有冤报冤，有仇报

仇”的口号，群情激愤，当场有六名受害者控诉高德贤当特务时所犯下的效忠日寇，残害群众，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等种种滔天罪行。在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下，判处高德贤死刑，为人民报仇雪恨。

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又在大佛寺院内召开群众大会，清算罪恶累累的伪警务科长汉奸石传家。石传家在任伪警务科长时，认贼作父，甘当日寇的忠实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并借职权之便，鱼肉人民，填饱私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民愤极大。县长李竞生根据群众的要求，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清剿土匪，安定地方。在日寇投降后，敌伪政府瘫痪，新政权尚未建立起来时，义县境内边远山区土匪顺势而起，并与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相互勾结，到处抢劫，为非作歹，闹得人民昼夜不安。

人民政府曾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进行了数次清剿。

一次，政委高风来同志率县支队到大榆树堡一带同多股匪徒遭遇，队员们表现得英勇顽强，战斗持续一天一夜，后我增援部队到来将匪击溃。

又一次，李竞生县长偕王忠同志率县支队和清河门小队去稍户营子附近剿匪。匪徒们慑于我县支队的军威，一接火就狼狽溃逃。

十二月，义县第一个民主政府刚刚为人民办了几件好事，在群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还有很多事要办。这时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进攻，我方奉上级指示，于二十八日进行有计划的战略转移，主动撤离了义县。

民主政府虽然暂时撤离了，但是它为人民办事的精神，

却留在了义县人民心中，为后来解放义县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旧社会土匪猖獗人民遭难

徐英华 孟庆祯

晚清、民国至伪满初期，辽西地区土匪猖獗。据老年人回忆，这个时期大帮土匪有上千人，小帮也有二、三十、百、八十人不等。匪首各霸一方，拉帮结伙，拦路抢劫，明火绑票，弄得鸡犬不宁。反动政府对此则无能为力，人民只有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社会极不安定。那时，人们把义县东北部与北镇接壤处的魏家岭、石门子叫做“鬼门关”，把细河沿子视为“畏途”。东部闾山小寺、老爷岭、旧站等地，西部大山底下一带，也是土匪出没无常的地方。

一九二一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有一名土匪因与刘龙台北水口子老李家早有私仇，突然杀掉李家十三口人，造成重大血案。一九二六年瓦子峪村蔡家沟有一户老张家是土包财主，被土匪打进去，用枪打死了张老大，又绑去了张老三，财物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把房子给烧了，造成家破人亡。一九二八年夏天一个夜晚，铁河嘴子屯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持续两三个小时，天亮听说，老齐家进去了土匪，打得很激烈，土匪死伤七、八名，东家齐老万身受重伤，天亮就死了。一九二八年秋天，稍户营子段洛惠被土匪绑去，事后花了很多大洋才把人赎回来，但人已被土匪折磨得不象样子，到家后不久就死去了。瓦子峪老赵家的两个小孩被土匪绑去后，蒙上眼睛放在地窖里三个多月，后来倾家荡产把孩子赎回来，但孩子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眼睛捂得看不见东西了。

还有拦路劫财，卸火车抢牲口经常发生。一九二四年春季，铁河嘴子孟庆福的大车走在魏家岭时，就被土匪把牲口劫走。至于谁家姑娘、媳妇好看就被抢，被霸占，有值钱的东西就抢走，稍有反抗就性命不保，则是常有的事。

土匪不仅烧杀抢掠百姓，内部也互相残杀，象黄土坎子的匪首杨百安，带着土匪去北镇绑票，得钱两千多元，回来在闾山的三角寺因分赃不均，被李山羊子开枪打死。边外马驹子沟的匪首韩景芳和他的小老婆，一天正在炕上抽大烟时，被他手下一个小头目开枪打死。马家沟一个报号“公平”的匪首，也被他手下的人，用斧子砍死在梨树园子里。

旧社会土匪如此众多，是当时反动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诸因素造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私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极不平等，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封官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反动当局极为腐败，对人民实行黑暗统治，贪官污吏鱼肉人民，民不聊生，官逼民反，为了寻求生路，走上绿林道路的人甚多。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或因惹了大祸，铤而走险者亦不在少数。一些封建官僚、财主和寺院，与土匪互相勾结，资匪、窝匪，互相利用，坐地分赃。如有的土匪因杀人隐藏在官僚财主家，就无人敢惹。帝国主义者也助纣为虐，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者沈阳南站设立“古岛冰窖”，名义卖冰，实际大量出售枪支弹药，也为土匪大开方便之门。如上种种，只能使土匪活动猖獗，无法息止。

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了民主改革，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政治上也再不受压迫和统治，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并

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土匪早已绝迹了。

一 次 兵 骗

吴 广 锡

一九二五年冬，辽西大地冰封雪飘，寒风凛冽，天空笼罩着战争乌云，正是奉军郭松龄回师关外，打算打倒军阀张作霖的时节。锦州通往义县的大道两旁驻扎着军队。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有的提前宰了年猪，埋藏了粮食；有的牵着牲口往西山沟跑反，想躲避这场兵灾战祸。

农历十一月一天傍晚，一伙约十来个军人，大背着枪向我双山子屯（今属七里河镇）走来。乡人向空鸣枪示警。他们若无其事地照常行进，只喊：“朋友！借道，我们借道！”入屯打听甲长住处。甲长招待他们吃了晚饭。掌灯时分，军人向甲长说：“我们哥几个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想干这行了，今晚要回家。可是我们异乡人，离家远，没路费，带军器更不方便，请甲长帮忙卖掉枪，凑点路费，就各奔各家了。”

甲长吴辅廷是五十多岁的老世路，知道军器买不得，怕有后患，就连忙推辞说：“老总们，咱这个小屯子，穷户多，买不起枪，请你们去外屯卖吧！”一方委婉地推辞，一方死皮赖脸地恳托。后来军人竟威胁地说：“枪若卖不出去，甲长就得借给我们每人几十元钱路费，枪作抵押，日后还钱取枪。”甲长无奈，只得把军人要卖枪的事告诉大家。

当时，社会治安不好。为了防匪，地方官勒令各村办“团练”，买枪自卫，规定五天地以上的农户得买一支枪，

但枪价高，又不易买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有些贪便宜的人，便跃跃欲试。虽然有些顾虑，可是一想有甲长出面，不会出什么问题，看看枪，全是名牌好枪，问问价又特别便宜，价值一百多元的枪，仅要价八、九十元。于是很快就卖出七、八支。最后有人竟以六、七十元低价就买到一支枪，子弹、子弹袋和刺刀都随枪带着。交易完毕，夜已过半，军人们改成农民打扮，怀揣现款就走了。

翌日，我亲眼看见买枪的人背着崭新的枪，腰围皮制子弹袋，炫耀自己买到了物美价廉的地道货。群众也赞不绝口。

第三天晚上，甲长家又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自称连长来号房子，并向甲长解释说：“我军大部队不日就来到，南屯（指谈家沟）住不开，借你们屯老百姓的房子暂住一、两宿。”甲长满口答应：“可以，完全可以。”

应酬之间，连长骤然面孔一变，厉声问道：“甲长！前天我连几名弟兄由此通过，被劫到你家，下了枪支，扒去军服，有无此事？今晚赶快交出来！”甲长一听，有如头上着了一闷棍，几乎昏倒在地，他申辩说：“枪不是劫下的，是军人自己卖的。”连长哪里肯听，逼甲长提着灯笼，派两名军人跟着到各买枪户，把枪全缴了回来。连长检查枪支无损，又说子弹不足。甲长答应，子弹如数作价赔偿。满以为就此了事，谁知连长又说还有两支手枪。甲长说：“军队里官长才有手枪，士兵只有大枪。”没容分说，就把甲长绑在过梁上。连长喝令搜查，把甲长的柜箱翻个底朝上，也没搜出手枪，而首饰、财物却被军人怀揣腰掖，据为己有。搜完甲长家又搜其他各家。踹门跳墙，鸣枪喊叫，人喧犬吠，全